考古让我们重新认识古代经济

宋晓航 郎剑锋

一粒炭化的粟，在灰坑里沉睡了几千年。它黑黑的，普通得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正是这样一粒不起眼的谷物，却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济的开始。

在人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古代经济似乎沿着一条清晰的发展道路不断前进——农业出现后，渔猎和采集逐渐退出；国家不断壮大，家族的重要性随之减弱；市场兴起之后，货币和商业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撑。新的制度不断出现，旧的制度不断消失，社会因此一步步走向复杂。

然而，考古发现呈现出的历史，远比这种线性图景丰富得多。

山东后李文化时期，先民主要依靠采集、狩猎等方式获取动植物资源，到了北辛文化时期，粟黍农业逐渐成为重要生计。但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同时显示，江河湖泊中的水生资源并未随农业发展而退出人们的生活。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菱角，也很难简单理解为天然采集的结果。植物考古研究提示，当地居民很可能长期管理湿地，使菱角成为稳定的食物来源。长城地带经历农牧转型时，农业、放牧、狩猎等不同生计方式也没有彼此取代，而是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组合。

古代经济的演进，并非简单的“新旧替代”。新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不断加入，原有方式仍持续发挥作用。对古人来说，多一种生计，就多一种应对风险的办法。农业、渔猎、采集和放牧相伴共生，并不意味着经济尚未成熟，恰恰反映出长期实践形成的适应能力。

一粒粟由此引出了经济考古学真正关心的问题。它关注的不只是古人生产了什么，更希望了解人们如何配置资源，为什么做出某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整个社会。随着社会规模扩大，资源配置也从维持日常生计，延伸到国家对原料、食物、劳动力和礼仪消费的调度。



▲山东临淄战国釉陶罍。

进入二里头至商周时期，这种变化表现得格外清晰。铜、锡、铅、绿松石等重要原料持续向政治中心汇集，经过规模庞大的手工业作坊，最终铸造成礼器和兵器。与此同时，稻、羊、牛等重要食物资源也更多地流向政治中心，并集中用于贵族宴飨、祭祀和礼仪消费。资源流动的方向，不仅反映生产和供给，也参与了权力空间与社会等级的塑造。

但国家层面的资源整合，并没有取代基层社会的经济单元。西周青铜器铭文和考古材料表明，土地、牲畜、劳动力以及不少手工业生产，依然由家族组织管理。国家承担关键资源的整合与调度，家族维系大量日常生产活动，两者相互配合，共同支撑社会运行。

货币和市场的发展，也没有沿着一条简单的演化道路前行。



▶山东前冢子头遗址出土炭化粟。

▼浙江田螺山遗址出土饱水保存的菱角。

图片均为**郎剑锋**提供



楚国黄金货币上的戳印，不仅反映重量和成色，也体现出政治权力提供的信用担保。它提醒我们，货币未必只是市场交换的工具，也可能服务于支付、贡纳、赏赐和财政管理。

河南郑韩故城内的中行遗址，则把问题进一步引向市场。这里存在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和频繁的物资流动，陶量和带有墨书文字的牛肋骨等材料一度容易被理解为市场活动的证据。聚落考古研究却表明，它们也可能反映官营作坊内部的物资配给、产品核算和行政管理。需要辨析的是，这些流动究竟依靠市场交易，还是依靠行政配置、机构管理等其他机制。市场识别，也是当前全球经济考古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山东两城镇遗址的石料来源研究表明，龙山时期普通聚落之间可能存在“多级聚落交换的网络模式”，不过这一解释仍有待更多产地和流通证据验证。它至少提醒我们，普通石料的远距离流动，未必都由政治中心或少数精英直接组织。

7至17世纪陶瓷业的发展，从“分组模式”逐渐发展到“分工模式”占据重要地位，其间还存在“共享窑区模式”的叠合与过渡。这些组织形态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在不同地区和时期交错发展，共同支撑了前工业社会规模庞大的陶瓷生产。

把这些材料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特点逐渐显现，古代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丰富。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存在国家征收、家族经营、亲属互助、地方交换、市场贸易和远距离流通等。不同组织方式承担着不同功能，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单独支撑整个社会。

今天，考古调查、稳定同位素、动植物考古、元素分析、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为经济考古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证据。房屋、墓葬和随葬品不能直接等同于财富，却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财富差异的长期变化。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开展更严格的量化比较，正成为值得推进的方向。学界已经尝试借助房屋面积、墓葬规模等指标计算基尼系数，以分析不同时期和地区的财富不平等。社会复原力同样成为新的研究重点。生计组合、资源储备和交换网络，都会影响一个社会面对灾害时的表现；但讨论复原力，并不能只看一个社会是否恢复，还要追问恢复的代价由谁承担。

中国拥有延续时间长、材料丰富的农业文明、早期国家和手工业体系，为理解前工业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窗口。这些材料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经济的认识，也可以检验国家财政、货币信用、市场形成、财富不平等和社会复原力等理论在哪些条件下成立，进而推动相关理论的修正与完善。现有许多通用解释主要建立在地中海、美洲等区域的案例之上，中国材料提供的不同历史经验，能够拓展我们理解前工业经济的范围。

经济考古学让我们看到，古代经济并非现代经济的简单前身，而是由多种机制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从这些细微而真实的物质遗存出发，我们正在重新理解古代经济，不断丰富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认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

博古知今

南京古城防洪排涝的智慧

李新建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与水共生、治水图强的奋斗史。南京这座六朝古都临江而建，有约3100年的建城史，积淀了深厚的防洪排涝的营城智慧，为新时代城市水患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无论是始筑于春秋的南京老城、始筑于汉代的六合老城，还是始筑于隋唐的溧水老城、明代的高淳老城，南京历代城邑无一例外均选址在河流凸岸，呈现出“玉带环腰”的空间格局。这并非偶然的审美追求，而是符合“凸岸堆积、凹岸侵蚀”河流动力学原理的科学抉择——凸岸水流缓慢、泥沙堆积，城址方能稳固。城池筑于临水岗地或河流一级阶地上，既高于一般洪水位以避水患，又便于取水用水和排涝。长江横贯、秦淮蜿蜒，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既有自然天堑屏障防御外敌，又有便捷水系通江达海控制全局，先民将取水用水、军事防御、防洪排涝、航运贸易等水资源综合利用发挥到了极致。

在南京低山丘陵地区，先民通过开凿切岭运河，将原本分隔的水系沟通起来，展现了卓越的区域统筹意识。胥溪河由春秋时期伍子胥督役开凿，穿越太湖与水阳江水系的分水岭，沟通两大流域，使吴国水师得以出其不意攻取楚都。这条比古邗沟还早20年的千年古运河，此后历经唐末“鲁阳五堰”的梯级通航、明初广通镇石闸的节制水流、清道光石坝的防洪固守，直至现代下坝船闸的建成通航，成为芜申运河的重要枢纽，诠释了因时而变、不断创新的精神。

破岗渎始于三国时期，孙权派遣三万士卒凿通句容岗地，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流域并连接大运河。为解决岗体两侧巨大水位落差，先民创造性地修筑14座埭，形成梯级航道，以人力、畜力拖船过埭，成为古代解决高落差通航的杰出案例。

胭脂河始于明初，崇山侯李新奉命开凿石臼湖与秦淮河之间的分水岭，以加强京师漕运。工匠们采用“火烧水激”的传统方法，历时两年在5公里岗岭上凿出深30米、底宽10余米的河道，并巧妙营造了“天生桥”的奇特景观。胭脂河与胥溪河共同构成了苏浙皖三地水运融合的伟大工程，至今仍是工程技术与景观艺术完美结合的杰作。

南京的城市格局与河道水系长期互动发展。六朝建康城位于秦淮河和玄武湖之间，疏凿环城水系，防洪济运。南唐金陵城向南拓展跨过秦淮河，奠定外河防洪、内河通流的水网格局。明初南京城向东、西、北三面大幅拓展，系统疏浚治理了新纳入城内的燕雀湖和金川河水系，形成城河一体、功能多元的综合水利体系。节制秦淮河进出古城的东、西水关与明城墙合为一体，闸身采用连拱式空心砖石结构，分上中下三层设防，科学解决了防洪、通航与防御的矛盾。与河湖水系相配合，城北通过明沟和数百座坑塘排涝并汇入金川河，城南民居稠密区建设了密集的砖砌暗沟排水系统，经东西官沟汇入内秦淮河，由官府负责定期清掏，商户居民捐款出力，并立碑禁止破坏，保障排水系统畅通。

到了当代，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南京市1975年自河定桥开凿向西分洪的秦淮新河，2025年实施秦淮河第三次切岭分洪工程——秦淮东河，与长江共同构成长达近百公里的新时代“环城水系”。明城墙是抵御洪水的重要屏障，文保工作者对城墙上设计精巧的古代排水系统进行修复，沿线布设了28处监测点，对水位、墙体应力、土壤含水率等数据实时监测预警，并依托南京智慧水务平台构建了城墙防洪排涝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模拟极端降雨、长江高水位等场景，提前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对于大多数古城都面临的历史地段内涝问题，南京市也进行了探索。小西湖历史地段更新项目借鉴传统工艺，铺设透水路面；恢复“快园春水”文化景观，重新开挖池塘，提高蓄水能力并作为备用市政、消防水源；建成国内首个历史地段微型综合管廊，解决了历史街巷狭窄、无法用常规技术铺设雨污分流和消防、电力、电信等各类管网的难题，2022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案例奖。

我们应系统研究、借鉴古代城乡建设中的防洪排涝智慧，在城市建设中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保障居民生活的长治久安。

（作者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家门口有文物

廉村城堡守流年

缪贞谊

周末，回了趟老家闽东福安，又约上好友到廉村走走。村子最动人的景致，依然是廉村城堡，虽经400余年风雨，却岿然不动，稳稳守着一方家园。

据《福安县志》记载，因沿海倭患爆发，地处水陆要道的廉村常受侵扰，村民遂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夜以继日，自发沿岸捡拾溪石卵石垒砌外墙，并用黏土夯筑内部，最终筑起这道基宽约4米、高约3米、周长约1200米的坚固城堡。城堡顶端辟有贯通的巡逻步道，站在道上，村落动静尽收眼底，为值守瞭望提供便利；同时，城墙间隔设置廉门、忠门、孝门、礼门、义门、信门6个拱券门，既可分流村民日常进出、疏散避险，又可根据各门情况灵活调配人力物力，优化整座城堡攻守。

在明代，城堡成功抵御了倭寇的屡次侵犯；革命战争时期，城堡掩护地下党工作，为红色事业再立功勋。2013年，廉村城堡成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城堡内的廉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它肇始于南朝梁代，独具风骨的村名则由盛唐敕封，这些可从《淳熙三山志》中寻得答案：公元502年，南朝梁光禄大夫薛贺带领族人从江苏南迁福建，定居此地繁衍生息；公元706年，第六世裔孙薛令之赴长安应考，成为开闽进士第一人，官至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后来，薛令之因不满奸臣当道而遭排挤，不久便辞官回乡，躬耕隐居。唐肃宗李亨登基后，追念这位清正耿直的已逝恩师，遂敕封其乡为“廉村”、其水为“廉溪”。

回想年少时的盛夏，总爱和小伙伴来城堡一带玩耍，有时躲墙垛草丛中捉迷藏，有时爬到城头抓知了，有时跳入廉溪捞鱼嬉水。累了困了，就去城堡旁的樟树林里打盹。如今上了年纪，喜欢翻阅方志族谱，对廉村了解渐深，甚至斗胆当起“免费导游”，既介绍城内的后湖宫、凤池、明月井等古迹，也解说城外的廉政公园等新景。当然，絮叨城堡的前世今生，必不可少。

近年，当地政府有序开展城堡加固修缮工作，整平墙外河卵石泊岸，拓宽古码头，对廉溪进行定期疏浚清污，古老城堡焕发新生。高空航拍，廉村城堡呈椭圆形，将整个村子闭环拥抱；而城外廉溪仿若一条碧绿飘带，萦绕古堡周身。如此一堡一溪，守护世代子孙安然，保全古迹风貌，也赓续廉洁文脉。



福安廉村城堡忠门。 缪贞谊供图

守望廊桥 守望家园

张 喆

上新了





图为甘肃漳陵桥模型（上）、湖南迎龙桥模型（下）。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供图

在我国山区，留存着2000余座廊桥。它们横跨溪涧河谷，是乡村工匠伐木垒石、合力建造的交通设施，也是承载集会、议事、祭祀、祈福等乡村生活的公共空间，亦成为人们寄托乡愁、维系情感的纽带。

2023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起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近日，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守望——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展”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拉开帷幕。展览分为“风雨廊桥”“三年行动”“守望乡愁”3个篇章，展出大量珍贵影像与实物，不仅诠释出廊桥的当代价值，也以廊桥为切口映射出文物建筑系统性保护的探索之路。

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桥上架设廊屋。然而，作为文物建筑中的一个小门类，藏于深山的廊桥较少被公众所认知。廊桥从哪里来，又为何而建？我们希望观众走进展区，能够第一时间找到答案。因此，第一篇章从“廊桥”一词的由来开篇，以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中国之廊桥》一文为引，通过《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追溯其历史渊源与类型特征；依托桥碑、题记、桥约等拓片和工具实物，呈现了一座廊桥从筹建准备、聘请工匠到选址动工、圆桥庆祝、养护维护的全过程。展览向公众普及廊桥结构、形态，也希望揭开廊桥背后蕴含的乡村营造智慧、共建共护治理传统以及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涵。

三年行动能否产生系统性保护实践成果？从行动之初筛查的1355座，到最终完成2193座廊桥的精准落位，廊桥资源拓展至15个省份；767座完成基础测绘，247座完成精细化测绘，198座实现全景影像留存，177项廊桥保护修缮工程实施。展览通过数据对比与现场影像，以微观叙事展现专项调查、记录建档、保护修缮、抢救修复、非遗传承等工作实录，让观众在细微处看见守护者的匠心与坚持，看见社会各界共同投入、当地居民倾力参与的守护图景。

另外，我们也希望以展览路线串联起系统性保护从调查、记录、测绘、勘察、研究、修缮、防控、管理、展示、利用、宣传的完整链条，让公众真切感受到：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在于廊桥本体的存续，还有与之关联的营造技艺、民俗活动及乡村生活图景的活态传承，更在于其承载的乡土记忆、文化生态在当代语境下的延续与新生。

我们将各省份提供的廊桥模型、廊桥调查报告等成果，结合全国廊桥资源分布地图集中展示。木拱廊桥、伸臂梁式廊桥、木平梁廊桥……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模型让观众直观感受不同地域廊桥的多元特征。尤其是山西、甘肃两省发现廊桥分布，打破了公众对于“廊桥只在南方”的旧有认知，彰显我国廊桥的类型之丰与分布之广。

在灾害抢险的危急时刻，全民参与的守望相助令人动容。展览陈列了浙江文兴桥、福建万安桥、湖南横板桥等的救灾影像，从村民自发打捞、搬运散落构件的感人场景，到专家与工匠依据历史图纸对散落构件辨认归位，再到非遗传承人遵循传统营造技艺进行榫卯加工、柱梁架设……人们共同努力，最大限度恢复廊桥原貌。

老匠人在修老桥、建新桥的过程中带徒授艺，年轻工匠有了上手实操的机会；传承人队伍显著壮大，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后继有人，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同推进。展览的第二篇章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重要成果作为结尾，强调系统性保护实践所焕发的文化生命力。

一座廊桥被搬到了展厅，模拟古树、桥畔、溪流、碇步桥构成的真实生活场景，引导观众在树下休憩、闲谈，走上廊桥，沉浸式感受今天的廊桥，并将视线从单体廊桥延伸至更广阔的山水、乡村。绿水青山，让人直观感受廊桥周边乡村环境的改善；家在桥边，使观众体会到廊桥与今天乡村社区的紧密联结；宜业宜游，展现出文旅融合带来的蓬勃生机。这里，既呈现了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带来的廊桥与周边环境、当代生活、乡村发展之间的变化，更勾勒出未来廊桥与村落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三年行动，不仅让2193座廊桥得到有效保护利用，更让“守望”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自觉。守望乡愁，不是停留在过去的怀念，而是面向未来的创造。当一座座廊桥重新焕发生机，当一个个村庄因桥而兴，当一个个群体因桥而聚，我们便真正理解了“守望”二字的分量。

为了那些镶嵌在高原上的瑰宝

柴焕波

2016—2023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9家单位参与，笔者主持的“西藏寺院壁画数字化”项目开展，累计完成寺院280余座。

这些散落在西藏各地的古老壁画，犹如镶嵌在高原山川上的瑰宝。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工作者进行了文物普查和专题调查，数以百计的古代壁画被发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对壁画的记录极为有限。近十几年来，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率先对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寺院进行壁画数字化，但系统性的寺院壁画数字化工作尚未启动，我们的项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展的。

在8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团队走遍了西藏的深山幽谷，从卫藏地区的农耕区、东南的深山密林、西北的游牧区到人迹罕至的边境，在无数偏僻的乡间小庙，记录着文明的残迹。摄影灯照亮长年沉睡的壁画，古老的容颜在眼前展现，它们是许多历史线索的末梢。

2017年夏天，我们调查了扎囊县康松桑康林。这座寺庙创建于8世纪晚期，按照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式样修建。当时，寺院关闭不接待游客，日复一日，我沉浸在静谧的殿内，思维流转于壁画、造像之间，既是一个追求学术理想的学者，在壁画中寻找知识点、宗教理路和参悟境界，又像虔诚的修行人，体验着内心的喜悦与安详。

也是那年夏天，我们在隆子县日当镇南部山中寻找壁画的线索。突然，一座古塔闯入眼帘，自然苍老的形貌，犹如我记忆中的老外婆。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不用打听，就是它了！塔身附着旧佛堂，最外围是一圈转经廊道，这种塔庙结构在印度西北和中亚地区非常流行。在西藏，一般塔庙是分开的，这个无名小庙，很可能是藏传佛教后弘早期业已失传的建筑模式。它躲过了时间的侵蚀，一直保存到现在，真是奇迹啊！小庙保存了可观的早期壁画，尼泊尔绘画风格，年代约为14世纪。此地属于日当村果组，在历次文物普查中皆未被发现，于是，我将它命名为“果拉康”。

那天在日当镇用餐时，早已过了午餐时间，席间，我感谢当地文物工作者曲桑的全程陪同，不然，我们在隆子县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曲桑说：你们专注、忘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激起了我们的工作热情，希望你们再来。汽车离开日当镇，开始翻山爬坡。我的背包里装着僧人送的藏香、曲桑送的哈达，心里暖融融的。我想，在这高原苦寒之地，神山圣湖之间，我已经接纳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像春蚕吐丝一样，最后一定会编织出我人生的彩衣。

西藏早期壁画凤毛麟角，一些偏僻的小庙，由于人为修葺机会少，反而保存了更多早期的实迹。这些早期壁画的保护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是自然侵蚀。寺庙建筑因受到过暴风、地震、融雪、冰雹、雨水的侵蚀，内部构件歪闪、腐朽、下沉，墙体内外酥化、开裂、渗漏，壁画层和地仗间黏结材料老化、收缩，导致壁画产生病变、起甲、龟裂、脱落、空鼓等现象。一些寺庙坍毁后，暴露在外的壁画更是迅速消失。第二是人为的损毁。许多寺庙的壁画在当代的维修过程中被重绘，除了少数的国保单位，文物部门一般难以制止，大量的古代壁画因此消失。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就是用数字化技术，将图像信息永久保存起来。这些资料不仅为藏传佛教考古、壁画图像学和西藏艺术史等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也为制定具体的壁画保护方案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计划建立一个西藏壁画信息中心，逐步实现部分壁画资料的共享。期待这些努力能对西藏文化保存和传播产生积极影响。



西藏那曲市邦纳寺藻井彩绘。 柴焕波供图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周飞亚